

05.05

28

烏盟史料彙編



编者的话

为了进一步推动乌盟党史资料征集和乌盟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开展，并为今后编纂工作创造条件，我们编印了《乌兰察布盟史料汇编》。

《乌兰察布盟史料汇编》是一部历史性、资料性、供参考的内部文集，它将不定期地分集印刊。所选载的文章，要求真实具体，富有考据。遇有学术之争，应摆事实、讲道理，讲究文风。希望热心于党史资料征集和地方志编修的同志，积极撰稿。

我们编辑这样的集子，确系初试，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贻误之处难免，望各方“有识之士”批评指正。

1983年3月1日

征 稿 启 事

《乌兰察布盟史料汇编》作为内部史料书，已经刊印了。今后还将陆续分集印发。它希望下列稿件：

一、关于乌盟地区的革命回忆录。

二、乌盟地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忆述、传略。

三、乌盟地区发展史上有着重大意义的生产变革、技术发明的经验总结和追述。

四、记述我盟山川、地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及行政沿革、文物古迹考。

五、反映各民族的风土人情习俗、民谣等。

欢迎有丰富阅历的老同志积极撰述，欢迎专家学者和有志于此的同志踊跃来稿。稿件内容务求真实准确，如引用资料请注明出处。

稿件一经采用或留作资料，即付予稿酬。

1983年3月1日

乌兰察布盟史料汇编

(第一辑)

- 内蒙革命史上的几个问题……………吉雅泰 (1)
- 沿着党指示的方向走……………奎璧 (15)
- 晋西北抗战经过概述……………贺龙 (26)
- 一年余来的大青山地区斗争……………李井泉 (34)
- 回忆抗战时期大青山地区的斗争……………姚喆 (49)
- 柳暗花明……………杨植霖 (59)
- 大青山抗日烽火……………陈刚 (87)
- 大青山斗争二三事……………贲厚 (141)
- 军队和老百姓……………张云 (155)
- 青
山
烽
火
- 驰骋雁北的宋支队
——宋时枪支队长在五寨欢迎会上的报告(162)
- 警备六团雁北绥南抗战纪实……杨克林 韩创业(165)
- 蛮汉山游击队创建前后……………
……………许振胡口述、凉城党史办整理(177)
- 蛮汉山区游击根据地的斗争……………
……………王英
……………胡三民口述 冯日新 整理(189)
……………乔志义
- 一个地下交通员……………
……………张二虎口述 林海鸥 李廷文 整理(198)
- 在归凉的一年半……………贾靖芜 凉城党史办整理(208)

刘澜涛同志办公室的来信……………(212)

白如冰同志给武川的信……………(214)

**·
乌
盟
春
秋
·
人
物
记
事**

九百年前的契丹女尸……北京自然博物馆时墨庄(216)

绥境蒙政会始末……………经革陈(218)

百灵庙兵变……………晓 范(227)

福岗留……杨植霖、白成铭、陈刚忆述、齐志诚整理(229)

高风英……陈连(根据《土默特史料》改编整理)(240)

李井泉借粮……………李锁成口述,赵占勇整理(249)

黄团长巧计捉叛徒……………李锁成口述,赵占勇整理(251)

地下军服厂……………梁劲秀,孟官官回忆,赵占勇理(253)

**地
方
志**

集宁历史沿革考……………王龙耿(256)

丰镇厅……………赤 邑(264)

**小
知
识**

乌兰察布盟得名……………师 照(266)

东四旗及中心旗简介……………晓 范(268)

关于兴和……………赫 驷(140)

封面设计、书写……………朝 鲁
魏泉深

封底:今日井尔沟(木刻)……………文 科

内蒙古革命史上的几个问题

吉 雅 泰

一、“五四”运动对内蒙的影响

“五四”运动是全国性的，对咱们这里的影响也不小，当时交通已经便利了，特别是学生、知识分子中运动多。对土默特旗的人有更深刻的影响，有些还是直接参加北京的“五四”运动，如赵瑞年，还有一个姓巴的（是石王庙小学的教员）等等。这些人回来给我们讲如何反对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如何抵制日货。接着，各个学校就成立了学生会，以后我们就在此基础上组织了全绥远区的学生联合会。土默特旗小学也有很多人参加了学生联合会的工作。由学生联合会领导学生运动，举行游行示威等，是很有力量的形式，运动达到了相当的高潮。接着就是抵制日货、关税自主、收复失地、废除二十一条等等，每次游行都是把标语贴得满街都是。到1923年，“五四”四周年纪念时，又有打“盛记”洋行的事，学生们把这个洋行的货物搬到大街上砸。原因是一些师范学校的学生到大街上宣传，讲解不要买日货的道理，并散发传单，也对“盛记”洋行的奸商讲抵制日货的

道理，但他不听，并说“哪国的东西有利就办哪国的”，并把传单揉挫了。这些同学回来给大家一说，同学们都很气愤，就又派去代表找这个奸商谈，但仍不听劝告，于是大家就商议好一定要砸这个洋行。但这个消息被警察局、教育厅知道了，教育厅还把我们叫了去。我们对教育厅说了很多道理，坚持要砸这个洋行。开始我们是让这个奸商把东西拿出一部分来砸，可是他不拿出来。当时学生有一千多人。我们就自己进洋行把东西搬到大街上来砸。学生们真清白，把手表一块块拿出来砸碎，专拿到大街上来砸，目的就是以表清白，因为怕有人说我们去抢东西，当时的警察只是维持秩序。

以后接着就是锯电线杆子。当时归绥办起个由日本人投资的电灯公司，栽电线杆时，不论什么地方都栽，有的是栽在人家正门口，在郊区是栽到庄稼地中心，并在电线杆子周围很大一块土地上不让种庄稼，所以市民和农民都不满。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也发动了砸电灯公司、锯电线杆子的斗争，我们在锯电线杆子时，农民、市民甚至一般的商人都同情我们。所以每当锯一棵电线杆子时，群众都鼓掌叫好。这样日本人投资的这个电灯公司也被我们搞垮了。

这些斗争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爆发的，但是就其直接原因来说，主要还是内蒙古地区社会矛盾的反映。这时内蒙地区的农民是非常苦的，受着几层压迫剥削，种地的收获仅仅能糊口，而地主富农有钱有势，富得很。当时有个规定，家有二百亩以上土地者，再有一个学生念书，就可免除任何差徭，所以地主富农都送子女念书，穷人没办法，很多人只能跑到蒙藏学校念书，因为那里是公费，当然更多的人

还是上不起学。另外有百亩以上土地者，就可以当个“会首”（即村长），可是一个村子里有数个、十多个、二三十个有当“会首”资格的人，而“会首”只能是一个，于是有资格当“会首”的人互相包庇，他们谁也不出钱纳粮。这个人当了“会首”，就不让其他有资格当“会首”的出钱纳粮，换一个人也是如此。所以，纳粮出钱等种种官差徭役全由贫农负担，中农也负担一部分。军阀打仗时，派车派人派马全由贫农或中农担负，即使派到“会首”头上，他们也怕打仗危险，而以高价雇贫苦农民代替他们去。这时正是马福祥当绥远都统，马福祥的军队无法无天，老百姓进城卖菜卖草，他们看见就得让你卸下来，不卸就要闯祸。他们下乡摧草，要的数量很大，根本无法付出，老百姓只好出钱贿赂，他们拿回分脏。至于士兵下乡抢骡抢马抢毛驴，什么东西都抢。老百姓是很苦的。

马福祥为了搜刮农民，又在绥远重新丈量土地，农民要获得土地就要马上交纳丈地银子，否则就失掉土地而破产。因为过去这里的土地有买有卖，农民们或多或少有点土地，这一丈量交不起丈地银子就变成了“公田”了。交银子整数要交钞票（如几元或几十元），零数（如几角）要交银元，三角钱折合银元一个，实际上也是掠夺的一种方式。怕错过了交款期限，失掉土地，大家挤着去交。收款的人为了下班，就从窗口泼出一杯开水，大家一躲，他就把窗口关上下班了。所以不少老百姓让学生去交，因为学生们服装整齐，一看就和农民不一样，他们也怕学生，不敢放肆。学生们就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酝酿着反对军阀当局的斗争，这是响应“五四”运动的内在原因。

二、中国共产党在蒙藏学校的活动

我们内蒙古的一批蒙古族青年在蒙藏学校学习的时候，中共北京党组织派人来给我们谈话、宣传。后来有一批人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CY），当时有乌兰夫、奎璧、佛鼎、赵诚、多松年、李裕智和我等不少人。当时北京党组织举行讲演、报告会或游行示威等活动，我们都去参加。那时学校办得不好，被一些官僚掌握着，学生们特别厌恶学校，不想在那里学习，而到北京师大一个补习班去学习，乌兰夫、奎璧他们也去啦。我入团以后，主要从事党布置的工作，学习成了附带的东西，因为工作太多就没有去。在学校里总也呆不住，后来被学校开除了。党对蒙藏学校的工作很关心，邓中夏、赵世炎等同志常去讲演宣传，李大钊同志也很注意蒙藏学校的工作。在学校里还组织过训练班，有不少人参加训练。这样培养了一批蒙古民族干部，为开展内蒙古地区的革命运动创造了干部条件。

在内蒙古革命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蒙藏学校也是很明显的。蒙古族青年学生中有很多人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干革命，这是大多数人，也是主流。但也有些人是想当官，不是真正要干革命，只是因为革命在当时很时髦，他们想通过革命来实现当官的目的。比如东蒙的白云梯、李丹山等一些知识分子，就公开说不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郭道甫也是如此，而蒙古族青年的多数则不然，就是相信共产党能解放蒙古民族。所

以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很明显的。以后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白云梯他们就叛变了，而且杀害了共产党人李裕智同志，还杀害了反对他们的两个蒙族青年。当时白云梯、郭道甫的势力很大，在大多数青年还没认清他们的本质的时候，是很难对付的。

蒙藏学校这批青年团员中的不少人，不久转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北京地区革命活动的重要力量。当时在北大三院经常举行各种报告会、演讲会，蒙藏学校的党团员都去参加。1925年初，我们党支持孙中山北上，发起召开国民会议运动，为了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党发动蒙藏学校的蒙族革命青年支持这个运动，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党还派我回绥远地区组织“绥远国民会议促成会”，选举奎璧、赵诚、崇德臣和我四个人为绥远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同志向我们具体地阐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要我们注意国民党右派的破坏活动，坚持党的四大确立的“扩大左派，批评中派，反对右派”的方针，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主张。在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和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期间，蒙藏学校的青年学生是很活跃的，也是一次革命实践中的锻炼。

三、中共北方区领导下的内蒙革命

党培养了一批民族干部以后，就着手开辟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工作。一九二五年初国民会议结束以后，党的北方区李大钊同志派我到绥远开辟工作。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党指派我

为绥远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组织这里的国民党党部，挂的是国民党绥远区党部的牌子，实际上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这时在内蒙古地区建立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四个平行组织，是四个党的工作委员会，直接受北方区的领导。包头工委李裕智负责，绥远工作我负责，察哈尔工委是一个姓张的负责（整理者按：可能是张良翰），热河是一个姓陈的负责（整理者按：可能是陈应潭）。中共绥远工委建立以后，下边又建立了莎县、和林、武川、归绥、土默特旗五个旗县的工委。莎县工委书记是李瑞，和林县工委临时书记是万寿，武川县工委书记是温财旺，归绥县工委书记赵绥恩，土默特旗负责人崇德臣、孙承业。一九二五年，北方区还派何资琛和共产国际代表瓦切尔劳夫同志到绥远检查工作。李大钊同志常派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帮助我们开展活动。

我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绥远国民党党部的执行委员，主要是搞统战工作，我们这里的国民党党证上把青天白日外面的白圈去掉了，所以当时有些反动分子说：吉雅泰他们搞的国民党是假招牌，其实是共产党的组织，这里的国民党赤化了，以煽动青年反对我们。

一九二五年秋天，在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起初叫内蒙古国民党，后改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张家口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瓦切尔劳夫、中国共产党代表江浩等四人，以及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丹巴道尔吉出席了会议，我是由党派我以土默特旗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乌兰夫、李裕智他们也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乌兰夫是以北京学生代表出席的。在这次会议上我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当时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正确的，它起初是革命的，李大钊同志很关心这个问题，我还到他家里请示过成立这个党的一些问题。当然在这个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代表上层路线的是白云梯、郭道甫这些人，他们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大革命失败以后，这些上层人物也先后背叛革命，变成了反革命。1927年8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乌兰巴托召开特别会议，把白云梯、郭道甫这些右派从中央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原打算把白云梯留在外蒙学习，不让他回来，怕他破坏内蒙革命，结果在外蒙右派领导人的支持下偷跑回来了，不久投靠了蒋介石国民党。郭道甫当时还留在中央做些工作，以示同白云梯的区别。不过他是个冒险主义者，他领导呼伦贝尔暴动遭到失败，以后就投靠了张学良。大概是在1933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取消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外蒙的机关和代表，以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起初是革命的，后来它的一部分领导人如白云梯、郭道甫等叛变了革命。至于日本投降后成立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以前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不同的，应该划分开来。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不久，党根据内蒙古地区民族组成的特点，为了广泛团结蒙汉各族劳动人民作为开展内蒙古革命的可靠基础，在张家口成立了内蒙古工农兵大同盟。李大钊同志和赵世炎同志主持了工农兵大同盟成立大会，内蒙古热察绥各地工人、农民、牧民和士兵代表二百多人参加了大会。李大钊同志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他特别强调蒙汉人民联合起来，共求解放的重要性，他还一再指出，蒙古民族要和汉族人民团结一致，才能得到自身的彻底解放。大

会选举李大钊同志为工农兵大同盟的书记，赵世炎、韩麟符为付书记，李裕智、王仲一、陈应潭等二十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决定编辑出版《工农兵》刊物，多松年是编辑，乌兰夫等同志还给这个刊物写过稿件。工农兵大同盟成立后，在热察绥各地发展盟员，建立组织，开展斗争。也曾想以工农兵大同盟的形势搞武装，也向李大钊同志建议过，李大钊同志答复是条件不成熟，条件成熟时，群众会提出的。在热河拉过一些土匪武装，包头也和哥老会挂上了钩，但是这些武装都没有搞成。

一九二六年初，我以绥远代表的名义，到广州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同行的有邓颖超、李裕智、于树德、李国璋、范鸿杰、韩麟符等。

从1925年开始，绥远地区的群众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五州”惨案发生后，中共绥远工委在归绥领导声援“五州”惨案的斗争，运动持续了一个多月。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游行示威，组织宣传讲演，发动劝募捐款，声势是很大的。1926年以后，农民协会在各地都有很大发展。这年秋天，在张家口准备召开工农兵大同盟扩大会议，这时冯玉祥的国民军从张家口西撤，党决定热察绥党组织也暂时与国民军一起西撤。

1926年冬天，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机关也随国民军向银川撤走。走到包头以西寒胜季窑子村，被张老么的土匪部队缴了械，一些物资和印章钤记也被抢走了。张老么的土匪已被我们收编为骑兵某部，李裕智为了搞这支武装，打入其中挂了个副司令，有点关系。白云梯、郭道甫返回包头，让我和李裕智同志前去说项，将印信枪支收回。我俩便

去见了张老么，经过交涉，解决了这次阻险，并到五原与白云梯他们会合，随即退到宁夏。

1927年春天，因为白云梯等处处打击、排挤我们，同时工作也需要我们回来从事地下工作，我和王瑞符以及他的随从副官杜祥三个人，拿着国民军的介绍信回到了包头、归绥一带从事地下工作。不久，李大钊同志被捕牺牲，参加中共五大的内蒙代表多松年同志也被奉军杀害，另一个参加五大的代表陈应潭走后再没有见面，以后听说在抗日同盟军与日本侵略者作战中牺牲了。在全国大革命失败的形势下，白云梯叛变革命，内蒙古地区的革命也进入低潮时期。

四、共产国际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对 内蒙古革命的帮助和影响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和帮助是很多的，对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更有直接的指导和帮助。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地区的革命一方面是由中共北方区委直接领导，另一方面是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领导，所以内蒙古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主要的。同时共产国际也直接帮助和指导内蒙古革命，起初共产国际派驻内蒙的代表是瓦切尔劳夫，以后是由驻外蒙代表兼管，这种指导关系一直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同志除了和中国共产党有直接关系外，还与共产国际驻内蒙（以后是驻外蒙代表）代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共产国际为内蒙古地区培养了不少民族干部，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的内蒙青年有几十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又派回内蒙工作。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就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成立的，这个党的活动也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的（当然以后有一部分人叛变了），另外在物质上和装器上也给以很大的支援，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的武器和经费是共产国际支援的。在共产国际学习的内蒙青年，被派回内蒙工作时的经费也是由共产国际支付。至于思想上理论上的指导就更具体了。所以，共产国际对内蒙古革命的帮助和指导是不小的，尤其在大革命时期的关系更为密切。

外蒙革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对内蒙古革命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帮助也是不小的。因为外蒙古同内蒙的蒙古族是同一民族，同一语言，历史上的关系也是极为密切的，地域毗邻，因此外蒙革命成功后对内蒙的影响是很大的。在大革命时期，外蒙为我们内蒙培养了不少干部，一方面是我们党往外蒙派内蒙青年去学习，一方面有不少内蒙青年和革命志士，为了寻求民族解放的真理，自动跑到外蒙去。另外去共产国际学习的内蒙青年也往往是经过外蒙去的，回来的时候也往往是经过外蒙回来。内蒙地区形势紧张的时候，我们就跑到外蒙避一段，形势缓和以后再回来。我们许多同志与共产国际接头也往往先到外蒙联系。我们党的一些领导人如王若飞等也是经过外蒙到内蒙的，刘仁、曾涌泉等同志也是从内蒙经过外蒙到共产国际。这种来来往往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许多老同志是知道这种情况的。

五、在莫斯科东方大学

我从宁夏回绥远后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内蒙地区的革命形势也很吃紧，国民党右派派了四个便衣监视我，所以我得经常换地方住。有一次，我们为陈应潭参加五大准备报告内容，突然来了几个便衣队的人，进门就问你们干什么？谁姓吉？我忙说这里没有姓吉的，我姓赵，还有姓巴、姓孙、姓陈的。并说我是土默特旗小学的教员，巴子江、孙承业是土默特旗总管府的科员。我没有介绍陈应潭。其中一个便衣就指着我说：“你就是吉雅泰，共产党，走！”于是把我们带走了。中途经过圪料街，我乘那几个便衣不备，钻到人群中逃跑了，其他三人被带回去，经过审问，核实了他们的职业就放了。陈应潭当时是游击司令，土匪军长郑泽生还想收编他的部队，于是也放了。

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和北方局联系不上，又因在这一带名声比较大，过去参加游行示威、群众大会，认识我的人不少，再加上已经叛变革命的麟祥、云继珍等，对我的情况更清楚，在国民党疯狂反共清党的情况下，很难继续工作。所以，我决定到莫斯科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接关系，并且在那里进行学习，武装一下头脑。

第一次，我是和勇夫、恒升三个人，打算从乌盟中公旗经蒙古到莫斯科，走到中公旗，因为反动王公的军队搜查得很紧，没有出了境，又返回来。以后，我又和金坤一、桂仲三个人一起到外蒙古。我向我们党驻在外蒙的负责人王瑞符

汇报了工作，王瑞符又把我们去苏联的事提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驻外蒙的三人小组福明泰、云润、察干喇嘛那里，要求共产国际驻外蒙代表阿穆嘎也夫同意批准。批准以后，给开了介绍信，于1929年夏末到了莫斯科，入了东方大学。金坤一，桂仲和毕力格巴特尔是一九三〇年到莫斯科入东方大学的。当时和我们一起在东大过党的生活的有白海风、王震东、布和巴雅尔、尔登毕力格、佛鼎；过团的生活的有高步瀛、毕力格巴特尔、阿得赫、阿科科夫等。

在莫斯科期间，参加了批判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学习，听过鲍罗廷的检查，还有蔡和森、康生、王明等给我们讲过课，李立三给我们讲了多次立三路线的错误。除了理论学习以外，还到苏联其他地方参观实习，学习过一种镗工手艺（冷铁匠），参加过苏联的土改和集体农庄的实习。每年暑假到黑海边上休假。所以，理论、实际、生活汇集在一起，是很好的锻炼。白海风毕业走后，我就是民族班的班长，凡是东大的内蒙学生，不分班次，都在民族班学习。我在东方大学第一年（1929）年在补习班专学俄文，1930年就在国际班直接用俄语听课。1931年又与毕力格巴特尔、金坤一、桂仲、高布泽博等在一个班学习，特别是哲学课，听汉语讲授才理解得深，为了学懂一些东西，实际上算退了一班，直到1933年才与毕力格巴特尔他们一起毕业。